

DOI:10.12361/2705-0866-05-04-124537

礼俗互动中的孝文化探析 ——作为孝子的董永与民间传说中的董永

何翠萍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 本文将董永故事为例对中国传统孝文化进行分析。发现在官方中是将董永作为一个孝子典范进行宣传, 自上而下推行孝文化; 而民间盛行的董永遇仙传说都以行孝作为遇仙的基础, 可见民间对孝文化的接受以及回应。因此中国对孝道的推崇并不仅仅是官方或者民间力量作用的结果, 而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官方和民间的交互作用, “孝”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共价值。

【关键词】 礼俗互动; 孝文化; 董永; 行孝

Analysis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the Interaction of Etiquette and Custom —— Yong Dong as a Dutiful son and Yong Dong in Folklore

Cuiping H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China 730030.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story of Yong Dong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ulture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Yong Dong is regarded as a model of filial piety in the official propaganda, and filial piety culture is promoted from top to bottom; However, the popular legends about meeting immortals in Yong Dong are all based on filial piety, which shows that people accept and respond to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Therefore, China's admiration for filial piety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official or non-governmental forces, but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two.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filial piety" has become the public value of China society.

[Keywords] Etiquette and custom interaction; Filial piety culture; Yong Dong; Filial piety

“礼俗互动”是近年来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率先倡导的用以分析社会制度与民俗传统的关系的学术概念。“礼”是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制定的社会规范, 而“俗”则是社会底层民众长期实践形成的生活习惯, 表面上看, “礼”与“俗”似乎是毫不相关, 甚至是对立矛盾的, 因为长期以来认为上层阶级是知礼的, 而百姓是粗鲁野蛮的。然而在中国语境下可以发现, 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 而是一种互动互补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之间一直是互动共生的关系, 民间自我生成的“规范”力量和国家权利意志之间既有分立又有合作, 既有纷争又有对话, 并谋求在对话、合作中从日常规范上升为公共价值。

本文以董永故事为例, 在礼俗互动的视角下, 通过分析作为孝子典范的董永与民间传说中的董永的演化路径, 试图理清“礼”与“俗”的发展路径, 以及二者融合发展的具体表现, 以此探讨礼俗互动与民众生活价值构建的关系, 并对新时代孝文化推行的现状提出思考。

1 作为孝子典范的董永

“二十四孝”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关于二十四孝子的故事, 其有戏文、书籍等多种载体, 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元代郭居敬编录的《二十四孝》一书。书中收入自上古到唐宋间的二十四个孝亲故事, 其中就包括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可见, 在早期传统社会中, 董永是被作为孝子典范的。董永故事最早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 山东嘉祥武梁祠是最早的关于董永故事的实物记载, 画面表现董永年少时失去母亲, 从事耕种, 到田间劳作时, 常用独轮车将年迈的父亲也推到田间方便照顾, 耕作之余为父亲送食物、饮水等的感人情景, 此时还没有出现后世所传的卖身葬父和仙女相助的情节。除此之外, 还有其它东汉晚期表现董永故事的画像石, 比如四川渠县沈府君阙东阙楼部、山东泰安大汶口画像石墓第二石等。此后, 各朝代均发现有类似画像石。

文献中最早出现董永故事的是《孝子传》, 世传为西汉刘向所做, 然而学界认为此书成书时间应晚于汉魏, 可能是后人假托刘向所写。故一般认为目前所知最早记录董永故事的文献是三国时

期诗人曹植创作的《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乘机”^[1]，在诗中，首次明确出现了神女这一形象和“神女乘机”的情节。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则更详细的记载了董永故事，不仅有画像石中的“鹿车载父”和《灵芝篇》中的“神女乘机”情节，还增加了“卖身葬父”这一情节。到这时，故事的中心还是集中在宣扬孝道上，但是其孝感文化已生成。

孝应该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它的意义也是几经周折才定型。孝的初始意义是尊祖敬宗、传宗接代。到了春秋时期，孝义指的是“追孝”，即追忆先祖的功德。而春秋到战国时期，孝义才从尊祖敬宗向“善事父母”转变，孔子是直接推动者。孔子强调孝与礼、孝与悌的结合，以此来维护社会、家庭的稳定。曾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孝文化的集大成者，对孝道的全面泛化几乎使得孝成为生活中的最高行为准则。孟子则将孝的道德伦理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在假托孔子所作的《孝经》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孝亲与忠君结合的思想。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则将孝这个道德观念在实践中完全政治化了。^[2]

孝观念在两汉的政治实践中尤为重要，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情形。首先，将孝义与忠君结合，强调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如董仲舒说：“故号为孝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其次，汉代实行了“举孝廉”的选聘官吏制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孝廉成为了天下士子为官的正途。最后，汉朝廷还在民间推行优待“三老”的政策。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策使得孝观念终于形成了系统的孝道理论，并延伸到了民间。

董永故事便是对其很好的证明。董永原型据考证生活在两汉时期，正是受了刚刚成熟的孝道文化的影响，董永故事才应运而生。纪永贵认为董永原型即《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的高昌侯董永，董永之父董武因政治原因被废，父子俩生活艰难，而董永在贫寒中“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是其孝行的具体表现，董永的孝行也流传了出去，因其孝行，董永复封高昌侯，进入东汉后，董永因其孝行被封侯的佳话就在民间流传开来。^[3]因此，董永因孝行被封侯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完全符合汉朝“以孝行治天下”的国家政策，而国家权利通过对个人进行封赏以达到推行孝道教化的效果，这是国家力量对孝的推行。但百姓也不是被动的接受，他们直观感受到了行孝所带来的好处，因此编成董永故事，而武梁祠画像则将董永行孝故事镌刻下来对子孙进行教化，这些则表明民间对官方推行制度的主动接受，而民间主动地推崇

孝行，则是对国家政策的回应。

2 “董永遇仙”故事

从官方作为孝行宣传典范的董永，发展为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董永，其故事核心已由宣扬孝行转变为歌颂非常规爱情。虽然其故事核心已改变，但是“孝”却是支撑董永故事的关键因素，也是其“遇仙”情节的出发点和推动点。最早记录董永遇仙的文献典籍是曹植的《灵芝篇》，但记载较为简陋。晋干宝的《搜神记》描写更为详细：“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忘，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以供奴职。道逢一妇人曰：‘原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4]其和假托刘向所作的《孝子传》中的董永故事极为相似。

唐代的《董永变文》篇幅明显变长，且情节也更为丰富复杂，其前半部分和《搜神记》《孝子传》类似，均讲述董永家贫，卖身葬父，路遇仙女，仙女与他成亲后织锦帮他还债，之后离别飞天。但《董永变文》增加了后续情节，主要说董永和仙女生了一子名董仲，由于被人嘲笑没有母亲，于是回家询问父亲原因，之后董仲便找阴阳家孙膑询问母亲下落，孙膑告诉他寻母之法。唐代之后，宋代也出现了新的话本《董永遇仙传》，总体继承了《董永变文》的故事脉络，但是情节、人物、故事模式都要更为复杂。《董永遇仙传》中首次出现了槐树的形象，董永不仅因孝行感动玉帝派仙女相助，与仙女分别后还因孝行和上贡异样绞丝被封为兵部尚书，并另娶妻。仙女生子后将其给董永抚养，名董仲舒，后董仲舒也踏上了寻母之路。董永遇仙传说经过时代的加工，情节内容越来越丰富复杂，但是其故事脉络仍然清晰：汉魏晋时代，其故事模式较为简单，即“行孝——遇仙——分别”，唐变文增加了“送子——寻母”情节，其中包含“三织女浴于池——阴阳先生泄天机——仙女以火惩罚”等新内容。^[5]

宋话本《董永遇仙传》之后，至今没有发现这个故事进入明清小说视野的任何痕迹，它只向戏曲形式一边倒了。^[6]元代即有“董永遇仙”题材的戏曲，明、清时期，“董永遇仙”戏更是广为流传。从明代戏曲选本可以看出，“槐阴相会”、“槐阴分别”成为“董永遇仙”戏主要的选目，这说明“董永遇仙”戏在继承“董永

遇仙”故事主旨和核心内容的同时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传统董永故事的“孝感”主旨在“董永遇仙”戏中逐渐被淡化，表现董永和仙女槐阴树下相会和分别的爱情戏开始成为“董永遇仙”中最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核心内容，孝感、遇仙、才子佳人模式成为杂糅在“董永遇仙”戏中的三个主要内容。^[7]

3 新时代的董永故事

进入新时代，对董永故事改编得最成功的是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但是董永孝行在电影中并未被突出，只是一个隐形情节，同时电影也不志在宣传董永的孝行，因此将董永借贷等情节全部删除，仙女对董永的爱慕也和他的孝行毫无关系，这都是新时代对孝观念持否定态度的表现。

董永遇仙传说在当代也极为受到重视，因为地方政府看到了董永故事的可利用性，在经济驱动下的董永文化，更侧重于其行孝品质而忽略其遇仙情节。因为地方政府极力考察董永的籍贯，认定他是历史真实人物，对他的历史认定愈可靠，其就愈不可能遇仙。宣称为董永故里的地方有三个，分别为山东博兴、湖北孝感、江苏丹阳。这三个地方纷纷组织专家对董永其人进行考察，并出版董永故事读物，打造当地的董永遗迹，举办评选“十大孝子”的活动等等，但最终落脚点均是希望以董永故事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发展经济。为了证明董永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甚至将仙女移出了董永故事，或者认为仙女是逃难的农民，但是这样就丧失了董永传说巨大的吸引力，因为董永之所以能引起巨大关注，得益于其行孝遇仙的传说。同时，他们还竞争董永的籍贯，将孝文化解释为地方文化，博兴和孝感在宣传孝文化时，都强调孝文化是当地的文化特产，然而，这却违背了孝文化的本质，孝文化既然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又怎么可能是地方性文化现象呢？可见，现在地方政府对董永的重视，并非是因为对孝文化的推崇，而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进入新时代，人们并不重视董永故事中的孝行，或者说孝文化已经不被今天的人所重视，人们对董永籍贯的考察，对孝文化的宣扬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建设的目的。

4 结语

从董永故事来看，孝文化的推行从来都不只是官方或者民间的事，而是官方和民间共同的努力，形成一种交互互动的局面。

在官方，董永主要是作为孝子典范的形象，因为孝行，董永被封侯，被纳入《孝子传》《二十四孝》等宣传孝行的书籍。即使在今天，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也极力推崇董永的孝行。在民

间，虽然董永传说、戏曲等核心集中在遇仙情节上，但是孝行始终是作为故事的前提条件存在，如果董永不孝，那么他就不能感动天帝令仙女下凡相助，孝行是故事存在的基础。因此，虽然在官方推行的董永故事和在民间流传的董永故事的尽管核心情节不一样，但是其并不互相矛盾，孝行要么是主题要么成为故事的基础，但并没有出现为了突出遇仙而剔除孝行的情况，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是和平共存、相互交织的，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同时，官方版本甚至成了民间版本的基础和养料，这说明民间力量并不一定总是处于官方力量之下的。时至今日，孝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明确提出孝敬长辈这一家庭美德建设要求；对于个人来说，在生活中更是需要孝敬长辈，不孝顺的人会被所有人唾弃，千夫所指。这正如张士闪所言：“礼与俗的话语，在国家统治阶层是治国驭民之术，在文人精英群体是安身立命之本，在民众手中则是社会交往的工具，由此形成了一种‘礼俗社会’的文化认同”。

但同时，新时代也有不利于孝文化推行的因素，正如上文所说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电影对孝行的删除，以及各地将孝文化宣传为本地特色文化，这些都是对孝文化的扭曲扼杀。当今社会，第三次全球大战就是文化的竞争，这更要求我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赵幼文. 曹植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2] 肖群忠.《中国孝文化》介绍与摘要[J]. 伦理学研究, 2004(04).
- [3] 纪永贵. 中国口头文化遗产——董永遇仙传说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学院, 2004.
- [4] 干宝撰, 汪绍楹校注《搜神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5] 纪永贵. 董永遇仙故事的产生与演变[J]. 民族艺术, 2004(04).
- [6] 纪永贵. 董永遇仙传说戏曲作品考述[J]. 戏曲研究, 2004(03).
- [7] 伏涤修. 古代戏曲对“牛郎织女”和“董永遇仙”传说的不同接受[J].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 2014(05).

作者简介：

何翠萍(1997.07-), 女, 汉族, 四川内江人, 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 21级在读研究生, 硕士学位, 专业: 民俗学专业, 研究方向: 区域民俗。